

对中苏两国庆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签订十一周年活动的双边考察

郭昊

[摘要]进入1960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裂痕已经严重扩大,并日益趋向破裂的边缘。但是,双方在当年11月举行的莫斯科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却取得了令人颇感意外的比较圆满的结果,一个非常具体和直接的体现就是——1961年2月两国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1周年的纪念活动搞得非常隆重。双方于准备工作、举办规模、宣传报道以及文章讲话等各个方面,都在努力地向对方展现出友好姿态。高度紧张的中苏关系在1960年底一度得到“缓和”的事实,也微妙地体现在双方举行的一系列庆祝活动中。

[关键词]中苏关系;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1周年庆祝活动;双边考察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5)04-0075-08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下简称“中苏条约”),标志着双方同盟关系的正式确立。从1951年开始,中苏两国政府每年都会依照惯例举行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周年的大型纪念活动,作为双方友好合作关系的见证。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伴随着中苏关系逐步恶化并走向全面破裂的事实,双方对于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周年活动的热情起伏不定。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庆祝活动已经成为直观反映中苏关系冷暖走向的一个“晴雨表”。本文即是重点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新解密档案,集中对1961年2月中苏两国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活动的历史过程,进行一番尽可能细致和深入的双边考察,以此来管窥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在双方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活动中的具体体现。

一、中苏两国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十一周年活动的历史背景

中苏两国的同盟关系自1957年“莫斯科会议”达到巅峰后,开始在不同领域产生分歧。步入1960年,双方的摩擦愈演愈烈。在当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苏双方发生严重冲突,苏共随即发表了六七十篇文章指责中共,两党关系持续恶化。7月,苏联突然单方面撤走全部在华专家3000多名,撕毁几百个经济合作协议,中苏关系已处在破裂的边缘^①。9月,中苏两党举行会谈,双方在苏共《通知书》和中共《答复书》的内容^②以及兄弟党关系等问题上,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最后双方不得不表示把争议问题拿到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继续讨论^③。中共决定尽最大努力达成协议,同时

① 参见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3~14页。

② 苏共6月《通知书》攻击了中共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及国际共运团结等问题上的观点;中共9月《答复书》则在“布加勒斯特会议”、苏联撕毁合同、中印冲突以及赫鲁晓夫企图联德反华等问题上进行反驳。参见《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1902~1997)》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8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1页注释[1]。

③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4~1578页。

表示不惧怕分裂^①。在中苏同盟关系面临分崩离析的紧要关头,1960年底的“莫斯科会议”使得这种严峻局面有所改观,中苏两党与会代表经过反复斗争和相互妥协,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等文件,并在消除“六点分歧”的问题(即:一、兄弟党之间是否独立平等;二、国际会议是否采取协商一致原则;三、如何定义派别活动;四、如何定义民族共产主义;五、是否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六、个人迷信问题^②)上基本达成一致。中苏两国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的活动,就是在两党两国关系如此一波三折的背景下展开的。

二、中苏两国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十一周年活动的基本情况

中苏关系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结束之后呈现出的暂时缓和的态势,对于两党两国而言都是来之不易和极为宝贵的。双方这种珍惜彼此同盟关系的心态,也通过数月之后隆重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的做法具体呈现出来。

(一) 苏联方面的庆祝活动

1961年1月31日,苏联驻华使馆参赞罗满宁向中国中苏友协副秘书长李希庚、李霭吾通告了关于苏联使馆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的活动计划,规模和方式与庆祝十月革命43周年相仿,并介绍了以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康斯坦丁诺夫为首的即将访华的苏联苏中友协代表团成员。李希庚等也就中苏友协活动计划、中方庆祝规模以及中国赴苏代表团情况作了简单说明^③。数日后,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联使馆2月13日冷餐招待会的具体安排正式通知中方,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全体中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体副总理、副委员长、各部部长等均在受邀之列。中国外交部积极做出反应,建议刘少奇和周恩来出席,其他受邀人员也尽可能到场,并请陈毅讲话,周恩来祝酒^④。为了与苏联步调一致,中国驻苏使馆也将拟举行的联欢晚会改为宴会^⑤。2月3日,契尔沃年科又向中方正式通知了苏联国内庆祝计划,包括莫斯科14日庆祝大会以及其它城市的友谊晚会;2月1日至15日全苏各地上演中国影片(包括中苏合拍片);苏代表团日程安排;苏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联合会、苏中友协、共青团中央、妇联、工会、科学院、作家协会等创作团体向中国相应单位发贺电,等等^⑥。

10日,苏联国内庆祝活动正式开始,活动安排共有30几个,参加人数一般均为二三百名,规模和气氛非常隆重友好。莫斯科青年友谊晚会由苏共团中央书记主持,期间曾奏两国国歌并唱《国际歌》,还有广播电视直播,并悬挂国旗;苏联高教部长兼友协副主席叶留金出席了国际关系学院和莫斯科人汽车厂联合举行的晚会,他在讲话中谈到中苏友谊时,离开稿子,多次提到1957年伏罗希洛夫访华一事;其余活动一般由学校或工厂党委书记主持。苏方讲话的基本精神都强调中苏友好团结和“中苏条约”的意义,有的还提到刘少奇访苏讲话中有关团结的话;一般都提到中国的建设成就、钢煤产量和农业生产成就,但不怎么提“三面红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

①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452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页。

③ 《关于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一周年大会计划、情况简报》(1961年2月1日~1961年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7-01292-01(以下简称“外交部档”),第15~16页。

④ 《苏联驻华大使为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签订十一周年举行招待会(请示、出席名单、陈毅副总理讲话稿)》(1961年2月11日~1961年2月12日),外交部档117-01528-01,第1~2页。

⑤ 《我驻外使领馆举行活动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有关情况》(1960年12月27日~1961年2月27日),外交部档117-01530-01,第14页。

⑥ 《关于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一周年大会计划、情况简报》(1961年2月1日~1961年2月6日),外交部档117-01292-01,第13~14页。

公社——作者注)和毛泽东的领导;一般都提到1960年“莫斯科会议”又一次证明了国际共运的团结一致;不像过去那么突出强调苏联援华,也都不提反帝和两国对外关系政策方面的问题。苏联群众情绪兴奋,热情高涨,在听到类似团结友谊的话时,多报以热烈掌声。一个到过中国工作的专家说“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我总把中国放到第一位,认为中国最好,最顶爱中国。”^①

13日晚,苏联驻华使馆举行盛大招待会,中国党和政府、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防委员会、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相关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均应邀而至,整个气氛非常热情友好。契尔沃年科和陈毅在讲话中都强调了中苏友谊团结是两国和平安全的堡垒,世界上没有一种势力能够动摇牢不可破的苏中友好关系。陈毅还讲道: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伟大的中苏同盟都将像磐石一样屹立不动,无敌于天下。周恩来则把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苏联代表团访华以及苏联成功发射第一个行星际站,并称为“三喜临门”^②。

14日,苏联在莫斯科工会圆柱大厅举行庆祝集会,大体做法与1960年庆祝条约签订十周年相同,整场气氛非常隆重、热情和友好,群众情绪也很高。苏共非常重视这次活动,苏斯洛夫、柯西金、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可、对外友协主席波波娃、对外文委主席茹科夫、苏联元帅崔可夫、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捷明切夫和市苏维埃主席鲍布洛夫尼柯夫等人均到场,苏斯洛夫甚至一直陪到文艺节目演出结束,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大会由苏中友协理事会主席安德烈耶夫主持并致开幕词,他重点强调中苏友谊具有特殊意义,两国人民友谊的进一步巩固,是争取和平斗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两国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其奴仆——修正主义者竭力企图离间这种团结,但这在过去和将来都是不能得逞的;为了争取确保世界真正的和平,两国还面临着长期和顽强的斗争。苏联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界代表随后讲话。刘晓和张苏的讲话使整个集会达到高潮,苏联群众多次主动鼓掌,并频频点头称是^③。15日《真理报》在第二版以将近一半的版面刊登了有关这次集会的报道,其中,特别提到中方关于对中苏同盟和中苏友谊的赞扬、对苏联成就的祝贺、对苏联援助的感谢、对1960年“莫斯科会议”积极影响的评价,以及中共一贯认为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团结是外交方针的表态;但是,对安德烈耶夫谴责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刘晓关于过去两国受到侵略者挑衅时相互声援、反对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三面红旗”,以及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就等内容,则未予刊登^④。

苏联方面此次宣传力度非常大,各报刊相继发表的文章数量多、报道篇幅长。11日《消息报》以《比磐石还坚固》为题发表了叶留金的文章;12日《真理报》以《不可摧毁的和平堡垒》为题发表了叶留金对塔斯社记者的简短谈话,《武装部队共产党人》第2期载有罗金上校《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一文,《新时期》第7期和《鼓动家》第3期则分别以《11年》和《两个伟大民族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为题发表了社论^⑤;13日《消息报》以《牢不可破的同盟》为题发表了社论,14日在第3版又以约半版的篇幅刊登了中国文化部长沈雁冰(即茅盾)的文章,《真理报》14日除以《永恒的友谊》为题发表社论之外,还在第一、二版详细报道了中国使馆举行招待会的情况,全文发表了刘晓和苏斯洛夫的讲话,第四版刊登了中国《人民日报》编辑部所编的材料,第六版报道了北京庆祝会和苏联使馆

① 《我驻外使领馆举行活动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有关情况》(1960年12月27日~1961年2月27日),外交部档117-01530-01,第12~13页。

② 《苏联使馆盛会欢庆苏中伟大团结 周恩来、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招待会 契尔沃年科大使和陈毅副总理一致指出 中苏团结是保卫和平的坚强堡垒》,《人民日报》1961年2月14日。

③ 《我驻外使领馆举行活动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有关情况》(1960年12月27日~1961年2月27日),外交部档117-01530-01,第45~46页。

④ 《Праздник великой дружбы——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 Москвы》,15 февраля 1961 года,《Правда》。

⑤ 《我驻外使领馆举行活动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有关情况》(1960年12月27日~1961年2月27日),外交部档117-01530-01,第41页。

招待会的情况。《真理报》编辑部还给每个加盟共和国报纸都发了一篇供宣传用的题为《兄弟的、永恒的友谊》的文章,同时苏联其他各报也都发表了有关的纪念文章^①。

宣传内容上,苏方侧重于:1、强调中苏之间的团结牢不可破。比如明确指出“帝国主义侵略集团花费不少力量,企图破坏它(指中苏友谊)的基础,在两个兄弟人民之间散播不信任的种子。但是帝国主义的挣扎是徒然的”(《鼓动家》的文章)。此类文章大都援引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强调中苏团结的话。

2、强调中苏同盟是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比如说“苏中条约是对巩固亚洲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巨大的贡献”(叶留金的文章);“苏联、中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警惕地注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阴谋,不断地揭发和平敌人的阴谋诡计,巩固自己队伍的团结一致,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罗金上校的文章)。

3、强调1960年“莫斯科会议”和刘少奇访苏进一步巩固了中苏团结。《新时代》和罗金的文章都引用了中国领导人致苏联领导人的新年贺电中关于刘少奇访苏的一段话。叶留金对记者的谈话也说,刘少奇的访问“以新的力量显示了”两国人民的团结。

4、比较突出地宣扬中国近三年来的建设成就。比如说中国“在最近三年当中以获得特别巨大的成就而闻名”(叶留金的文章);中国的“经济在1958年~1960年有了特别蓬勃的发展”(罗金的文章)。但一般不提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只有个别文章提到中国“目前正在巩固人民公社的基础上广泛实现农业机械化,建立大型水利工程,以进一步增加农产品”。

5、强调苏联援助对中国建设的作用,比如说“由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在中国正在建设着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基础”(《鼓动家》文章);“依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罗金的文章)。少数文章提到了中国援苏,比如说中国也“在给予社会主义各国以援助,向苏联提供工农业产品和原料”(叶留金文章);“在苏联的若干经济领域里,也在顺利地利用中国的经验”(《新时代》文章)。

6、只有叶留金的文章涉及到对当时重大国际问题的一些看法,如仍旧强调“目前的问题只是,或者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或者毁灭性的战争,其他出路是没有的”;“目前已出现从社会生活中消除战争的实际可能性”;和平共处是“我们时代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和明智的原则”,等等。另有少数文章提到美帝国主义^②。

(二) 中国方面的庆祝活动

1960年12月,在获知苏联方面准备大规模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的情况后,鉴于双方关系呈现出的新态势,中国驻苏使馆希望中共中央也早作考虑,并提前提供宣传工作所用的提纲、影片、图片等^③。时隔两周,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联合会的达尼洛夫赴中国使馆了解中方庆祝安排,此时中方已从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工作人员处获悉,鉴于11周年是非逢五逢十的庆祝,预计苏联方面的活动规模不会太大。中国使馆考虑,无论苏方隆重与否,都应配合1960年“莫斯科会议”后好转的形势,利用这次机会积极开展友好活动,作为加强团结的重要措施,并草拟了一份庆祝计划^④。1961年1月21日,达尼洛夫再赴中国使馆,向张德群代办透露苏方庆祝规模同十周年差不

^① 《我驻外使领馆举行活动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有关情况》(1960年12月27日~1961年2月27日),外交部档117-01530-01,第47页。

^② 《我驻外使领馆举行活动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有关情况》(1960年12月27日~1961年2月27日),外交部档117-01530-01,第41~44页。

^③ 《我驻外使领馆举行活动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有关情况》(1960年12月27日~1961年2月27日),外交部档117-01530-01,第6页。

^④ 《我驻外使领馆举行活动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有关情况》(1960年12月27日~1961年2月27日),外交部档117-01530-01,第7页。

多,并暗示这个计划已得到批准,希望了解中方庆祝计划等事宜^①。

26日,中共中央外事小组提出适当扩大庆祝活动规模的建议,制定出初步方案,并拟于2月14日前后以一周时间进行宣传,重点是:1、中苏同盟对促进两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意义;2、中国维护1957年“莫斯科会议”和《莫斯科声明》、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团结特别是中苏团结的一贯立场;3、突出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和对世界和平做出的努力。《人民日报》拟发表社论,以一周时间辟专栏介绍苏联建设成就和庆祝活动,《真理报》此时已决定以一周时间辟专栏介绍中国情况,其它中央级各大报发表纪念文章或社论,省市级报纸只转载《人民日报》社论和报道全国和当地的庆祝活动消息,对外刊物可适当进行宣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可适当举办以中苏友好为内容的广播电视节目,北京和各大城市的电影院有计划地放映苏联影片,中苏友协分会所在城市举办图片展览或橱窗展览^②。

按照中方往年惯例,若元旦期间已同外国驻华使团等机构举行过联欢,则春节不再另外宴请。但为了庆祝“中苏条约”11周年,中共决定由陈毅于2月14日晚再以宴会形式邀请各国使节夫妇和外国专家共度春节,其他省市可由专家所在单位或部门主要负责人分别举行宴会和联欢,也可进行家访或慰问患病专家;苏联领事馆或代表机构所在省市,可按往年惯例决定是否举行宴会;外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所在单位,可邀请其参加春节文娱活动或组织一次小型联欢^③。同时,中共亦批准驻苏使馆邀请苏中友协代表团访华,并于30日去电波波娃和安德烈耶夫;中苏友协也接受苏方邀请,并拟派十人左右代表团^④。中国外交部还指示驻苏使馆可举行一次联欢活动,邀请平日联系较多的苏联政府部门和群众团体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如果讲话祝酒,需根据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议、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声明和刘少奇访苏时的讲话精神草拟^⑤。中共外事小组随后又发出补充通知,强调所有联欢宴请应以庆祝条约11周年为主要内容;有苏联友人的场合,应以苏联友人为主宾;主持人讲话时,应强调中苏及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和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反帝国主义力量的相互支援,并感谢兄弟国家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⑥。

2月3日,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余湛向苏联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详细介绍了13日的庆祝计划。庆祝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由中苏友协总会副会长吴玉章主持,郭沫若讲话,并邀请契尔沃年科和康斯坦丁诺夫讲话。出席人员总计约3300名,中方主要包括:1、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政治局委员彭真、陈毅、陆定一、罗瑞卿、习仲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及在京常委,政协全国副委员长包尔汉及在京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傅作义,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承志、文联副主席周扬、科协主席李四光等;2、中苏友协总会和北京市中苏友协相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3、人民团体负责人;4、解放军驻京部队将军;5、中央、华北、北京市及解放军各机关负责人及干部,北京市各界代表人士。外宾主要包括:1、苏联驻华大使及全体外交官和工作人员,苏中友协代表团

① 《我驻外使领馆举行活动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有关情况》(1960年12月27日~1961年2月27日),外交部档117-01530-01,第9页。

② 《中央关于中苏友好条约十一周年庆祝办法指示》(1961年1月26日~1961年2月12日),外交部档117-01530-02,第2~5页。

③ 《我驻外使领馆举行活动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有关情况》(1960年12月27日~1961年2月27日),外交部档117-01530-01,第16~17页。

④ 《我驻外使领馆举行活动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有关情况》(1960年12月27日~1961年2月27日),外交部档117-01530-01,第15页。

⑤ 《我驻外使领馆举行活动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有关情况》(1960年12月27日~1961年2月27日),外交部档117-01530-01,第1页。

⑥ 《中央关于中苏友好条约十一周年庆祝办法指示》(1961年1月26日~1961年2月12日),外交部档117-01530-02,第18~19页。

全体成员及其他在京苏联友人(包括在中国各机关工作的苏籍人员和国际列车苏籍人员);2、兄弟国家驻华使节、外交官以及兄弟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在京专家等;3、苏联及兄弟国家在京的留学生。另组织群众约7500人。拟请就坐主席台的双方代表共计38人,中方有周恩来、陈毅、习仲勋等,苏方有契尔沃年科和苏中友协代表团全体成员。周恩来在中间休息时将接见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并邀请契尔沃年科参加接见。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报道大会消息并发表讲话全文;新闻电影制片厂将拍摄新闻纪录片;北京电视台将播报电视新闻^①。达利柯夫为这个计划感到兴奋,并通告了苏联国内庆祝计划和苏联代表团日程安排^②。当天,中共中央将这份庆祝计划作为正式方案传达给了其它中央及地方相关部门。

2月12日,当获悉中国代表团在苏联受到隆重接待的情况后,中共外事小组单独电告上海、浙江、广东、湖北、河南并当地外事小组,要求需十分重视对苏联代表团的接待工作,省、市中苏友协会长、副会长和相应身份的人需亲自出面,并组织50人左右的迎送队伍,向全体团员献花,可举行宴会一次(三至五桌),省(市)委第一书记要接见代表团一次,并主持宴会。上海、广州的全市庆祝大会,俟代表团到达后再举行,并邀请团长讲话,上海可举行200人左右的送别酒会,武汉应选择一两个较大的基层单位,俟代表团到后举行庆祝会,并邀请代表团参加。所有活动都应注意组织宣传报道^③。

13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庆祝集会正式举行,与会人员达一万多名。大会堂主席台上并排高悬着两国国旗,其下端交叉在一起,象征两国“伟大的团结”,两边悬着“1950-1961”巨型金色字标。当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与苏联代表一起步上主席台时,全场一致起立,长时间地鼓掌表示热烈欢迎。双方代表在讲话中都对“中苏条约”的作用、中苏同盟的意义以及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影响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也都提到了两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整个会场充满了团结、友谊和欢乐的气氛,大会持续约3小时^④。

同一天,中国驻苏使馆也举行招待会,共发出请帖600多张,实际出席的苏联客人达526位。苏方非常重视这次招待会,赫鲁晓夫及夫人、女儿,苏斯洛夫、米高扬、柯西金等均出席,其他包括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及夫人,苏中友协主席,各部委、群众团体负责人和莫斯科劳动人民代表,以及很少出席外交活动的中型机械部长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等;军方代表有11个元帅、5个大将以及18个其他将校,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未到(在宴会前打了招呼);外贸部长因病不能赴会,其他副部长均到场。与会苏联人士对赫鲁晓夫的出席感到非常高兴,“苏军之家”主任说“赫来,这象征着 we 全党全国全军都来参加宴会了。”外交医院院长说“他来了,以后就好了。”《莫斯科——北京》歌词作者说“赫昨天才回莫,很疲劳,今天来出席宴会不是偶然的。”

宴会中,双方强调最多的是中苏友谊和团结的重要,也有不少人专门为毛泽东干杯。医学科学院一负责人说“那一阵子我像得了病似的,现在我们的关系可好啦,我很高兴。”“苏军之家”主任说“苏中友谊就是特别重要,不同于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友谊。”外交部一名人员说“苏中两国团结是最重要的,也必须如此,人民要求团结。”还有的表示“希望我们之间没有一点分歧。”“如果说中苏团结过去如同钢铁,现在则是金子。”前《友好报》主编罗果夫说,他一生都要献给中苏友谊;有人私下透露,罗果夫的中文打字机还保存着,说将来总有一天还要用。苏方人员对刘骁的讲话普遍表

① 《关于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一周年大会计划、情况简报》(1961年2月1日~1961年2月6日),外交部档117-01292-01,第8~12页。

② 《中央关于中苏友好条约十一周年庆祝办法指示》(1961年1月26日~1961年2月12日),外交部档117-01530-02,第20~23页。

③ 《关于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一周年大会计划、情况简报》(1961年2月1日~1961年2月6日),外交部档117-01292-01,第12~13页。

④ 《中国——苏联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一周年:请示报告、莫斯科赠送汽车玩具大会剪报、展览会及报道》(1961年2月9日~1961年10月23日),外交部档117-01292-08,第6~7页。

示满意,对外文委主席说,刘骁的讲话给他的印象很深;电站部长说,这个讲话使他感到友谊的巩固和加强;塔斯社记者听到讲15届联大一段话时说,这是对苏联的支持。在业务方面,苏外交部远东司一名人员提到,过去在中国的有些苏联地质专家行为不好,很难管理。科学院干部局副局长主动询问中方,打算何时派中国留学生来苏学习,他还为中国学生控制着一部分名额。电站部长说:将在1961年3月召开的全苏火力发电站建设会议不邀请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参加,但文件可给中方参阅;副部长说,过去在西班牙召开的世界动力会议上,由于他的提议,把蒋介石分子弄垮了。宴会后放映的《革命家庭》一片也受到与会苏方人员的广泛好评^①。

14日,陈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宴会暨春节联欢会,规模为175桌,整场气氛非常友好热烈。与会外宾约1000人,包括苏中友协代表团全体成员、苏驻华使馆全体外交官及夫人、苏联留学生、聘请的外国专家及夫人、各国驻华使节、三等秘书以上外交官及夫人,以及应邀访华的各国代表团和外宾等等。中方出席人员约650人,包括周恩来、谭震林等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防委员会、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和政府其他部门主要负责人、解放军将领、外宾和外国专家接待单位陪同人员,以及北京市教育、科学、文艺、劳模等各界人士^②。双方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中苏团结和友谊的重要性,北京著名的艺术团体和艺术家还表演了中国、苏联等19个国家的音乐舞蹈节目^③,活动至23时半方告结束。

三、对中苏两国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十一周年活动的解读

根据中苏两党之前的协议,只有逢五逢十的条约签订周年才搞大规模庆祝^④。11周年不是逢五逢十周年,更兼1960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尤其是苏联单方面中断了两国间的经济合作,这就更使得双方这种隆重纪念的做法显得不同寻常,也间接证明了不断恶化的中苏关系此时得到稍许缓和的事实。

(一) 苏联方面庆祝活动的特点

苏联此次举行庆祝非常主动,准备也很充分。其不仅积极与中方保持沟通,还单方面决定将庆祝规格提高到10周年的水平,并通过一系列文章和讲话展现出友好姿态:

1、对中苏同盟的作用和意义的提法高于1960年。以往的常见说法是“中苏同盟是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威力不断加强的重要因素”,“是影响世界历史发展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强大最重要的因素”。此次则提到中苏同盟“十倍地增强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力量”(苏斯洛夫讲话),是“侵略者实现其计划的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各国人民和平与安全不可摧毁的堡垒”(《红星报》),甚至第一次把中国革命同俄国十月革命并列列为“人类历史上两个最伟大的事件”(《真理报》)。

2、非常罕见地突出强调两党团结。如中苏“牢不可破的友谊的基础是苏中两党的团结”,1960年“莫斯科会议”与刘少奇访苏表明,两党“在一切基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红星报》)。加强两党友谊是“苏联始终不渝的愿望”,中共也十分重视“同苏共的团结和发展中苏的友谊”(《真理报》)。几乎所有文章讲话都引用了赫鲁晓夫关于团结的一段话“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确保和平和建成共产主义;共同的利益——劳动者的幸福和康泰;共同的坚定原则基础——马列主义。”

^① 《我驻外使领馆举行活动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有关情况》(1960年12月27日~1961年2月27日),外交部档117-01530-01,第50~52页。

^② 《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一周年并春节联欢宴会请示、执行情况、出席人员名单、专家出席安排、祝酒词、注意事项》(1961年2月7日~1961年2月13日),外交部档117-01527-01,第27~29页。

^③ 《陈毅副总理举行节日盛宴招待苏联和各国友人 欢庆中苏两国的伟大团结 欢庆全世界人民伟大团结》,《人民日报》1961年2月15日。

^④ 《关于庆祝中国苏联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六周年事项》(1956年1月21日~1956年2月1日),外交部档117-00626-01(1),第6~7页。

3、强调苏中两国在外交斗争中互相支持,密切配合。一般都提到苏联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支持解放台湾,并谴责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也提到中国支持苏联关于裁军和禁核的建议,苏斯洛夫还重申了侵略中国就是侵略苏联。

4、对苏联援华强调得较以前少些,而相互援助则说得更多些。《经济报》提到苏中合作原则是每一方给予另一方以自己积累起来的全部经验,苏斯洛夫也说“苏联的成就是同兄弟中国的伟大友谊和合作分不开的”^①。

(二) 中国方面庆祝活动的特点

中共无论在活动规格、活动形式、场所布置还是出席人员级别,都力求在全局和细节上同苏方步调保持一致,甚至借助传统春节的机会,把纪念活动搞得比苏方还要隆重,同时在宣传力度上也和苏共紧密配合。《人民日报》自1960年2月3日起就开始了关于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活动的报道,一直到3月16日止,前后共持续长达一个多月时间,共刊文达33篇之多,内容从双方不同级别领导人往来贺电及出席各种场合的讲话,到部分社会团体及单位代表人物的纪念文章,再到部分地区及单位举办的庆祝活动,可谓应有尽有。这一方面表明中共仍然承认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袖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共对逐渐恶化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在1960年底得到稍许改善的事实,具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四、结 论

中苏隆重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的做法,与当时两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不无关系。进入1960年后,赫鲁晓夫通过广植玉米以提高粮食产量的做法,日益严重地脱离实际,苏联集体农庄耕地份额逐年减少,农业状况持续恶化^②。国际上,1960年5月的美国U2间谍飞机事件,使得美苏关系改善化为泡影^③;10月,联合国大会又否决了苏联关于裁军问题的提议^④。苏联面临的内外困境,尤其与美国关系的恶化,都迫使赫鲁晓夫不得不谨慎处理对华关系。

中国方面的处境则更为艰难。进入1960年以来,已持续三年的“大跃进”运动、各种自然灾害,以及苏联单方面撕毁合作协议的行为,导致中国整体经济状况出现严重困难^⑤。国际上,1960年1月,美日重订《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⑥,进一步威胁台海安全;4月,中印就边界问题的7次主要会谈收效甚微^⑦;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更遭遇了兄弟党围攻的局面^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呈现出不利于中共的态势。1960年中苏所面临的这种严峻的内外形势,迫使双方仍要抓住任何机会以稳固同盟关系,极力避免走向分裂。“中苏条约”是维系中苏同盟的纽带和法理基础,且“中苏条约”签订周年活动还是一个每年都有的传统节日,双方自然会通过这个节日向彼此释放友好信号,中苏隆重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也就在合乎情理之中。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江俊伟]

① 《我驻外使领馆举行活动庆祝中苏条约签订11周年有关情况》(1960年12月27日~1961年2月27日),外交部档117-01530-01,第47~49页。

②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烨、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29页。

③ 陈新明《十八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版,第678~679页。

④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461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57~562页。

⑥ 《艾森豪威尔和岸信介发表会谈公报 日美两国加紧勾结扩军备战》,《人民日报》1960年1月21日。

⑦ 齐鹏飞《大国疆域:当代中国陆地边界问题述论》,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91~107页。

⑧ 伍修权《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251页。